

# 毛澤東思想、模式與金錢

顧汝德著  
梁潔芬譯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極力提倡向模範事物看齊，特別是向大寨的生產大隊及大慶油田學習。這運動有以下的優點：這些「模式」是毛澤東把經濟原理付諸實踐時的典範。大寨及大慶的農民及工人似乎要向全國的民衆昭示：地方團體，在正確的政治理想推動下，藉苦幹能達至什麼成就？再者，大寨和大慶的模式，為發展中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提供了一項答案，就是：如何不用花費高薪厚酬而能增加生產量；假如一個貧窮國家能在工資及物質獎勵上省回一筆，更可把增產所得，作為擴大投資及翻新經濟之用。

自一九七八年底以來，大寨和大慶備受批評，它們不再被認為是全國工農應學習的崇高模式了。一般而論，模範事物所扮演的角色，已被低貶；若要農民及工人增加生產，非倚靠現金及其他獎勵不可。大寨和大慶在文革時期，被指責為跟隨「左傾」路綫，它們的領導人被指斥犯了大錯誤，以及在經濟政策上犯了所謂「平均主義」的錯誤。

他們對大慶的批判倒不太嚴苛，因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這項由中國成功地建起來的石油工業，已到達了相當產額的程度；大慶在這一點上實在扮演了先鋒的角色。再者

，大慶繼續生產全國每年產油量半數的原油，這就是說在全國經濟上，大慶仍高踞要席，因為它扮演的角色委實太重要，不能在政治上受貶黜。大寨的情況就不可同日而語了，這個在華中農村裏缺乏經濟資源的生產大隊，在毛澤東死後就不能起政治性影响。

中國領導人從政治上去批判這些模式，實是他們廣泛地去使管理現代化、及刺激中國勞動力計劃的一部份。在社團中曾存在着幾股抗衡的力量；中共當局試圖在物質獎勵及以大慶、大寨模式為基礎的傳統政治運動之間，建立起一種新的平衡。

## (一) 探求可靠性

大寨及大慶的致命傷，就是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後，全國對毛氏思想及全民政治運動的懷疑態度。一九七七年，省政府開始處理在學習這兩個模式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訛騙事件。有些單位急於達到大慶及大寨式企業的水平，不惜虛報增產的數字。（註一）第二步就是對大寨及大慶在文革及四人幫下的行為重新評估。在翻看紅衛兵及其他文革時的資料，可知那些「極左派」人士，

最初對某些模式極表懷疑。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江青由始至終對大寨的領導人加以反對。雖然如此，大慶和大寨應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部份，因此，當毛澤東思想及文革被貶黜時，它們也難逃劫數。

大寨受到破壞性的批判。對它的抨擊都是有關生產大隊領導人個人人格的完整、政治上的殘忍、個人的野心等問題。直到渤海二號鑽油台翻沉前，上述的指控不易落到大慶的領導人身上。自從渤海二號悲劇出現後，石油工業也步武大寨的後塵，成了公眾醜聞和攻擊對象。（註二）雖然這兩個模式的政治背景相當混亂，但經濟理由亦足以左右政府對它們的態度。事實上，大寨曾被視為一九七七年改進農業的急進計劃的一部份；而大慶的真正錯誤則與一九七八年宣佈的大量投資計劃有關。這些投資聲言可在一九八五年造成十個「大慶油田」，使國家產油量提高至每年二億五千萬噸。（註三）當時中國的石油仍然短缺，以致大慶的投資計劃更顯得規模龐大。到一九八一年底，這個油田的聲譽已獲部份平反，再成為國家的典範。（註四）另一個有關模式的問題：就是全國在短期內無法追上這兩個進步的生產模式。在「學習大寨」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一年內全國只有一百個縣能夠被列為大寨式的生產單位。在這比例下，非到一九九九年後，中國境內各縣不能提高到大寨的生產水平。（註五）在「學習大慶」的事件中，情況並不會較好。至一九八〇年為止，全國四十萬個企業單位中，只有一萬個符合大慶的標準，（雖然有三分之一大型及中型企業已贏得這份殊榮）。（註六）顯然，學習兩個模式的步伐已放緩，模式的可信性大為削弱。

## （二）連接過去

雖然政府有許多不同的理由可以放棄大寨和大慶，但實施上却不容易。基本的困難是全國有為數頗眾的農村及工業可堪稱為大寨或大慶式的生產單位。昔日它們曾與上述的兩大模式相連，今日則備受批評。問題是：成為了先進的生產單位後結果又怎樣？應否指責它們學習兩大模式之舉為錯誤？

中共領導階層對大寨在態度上的混淆，使問題更為複雜。一九七七年中共向人民警告，指出大寨經驗的錯誤。（註七）但在同年九月召開的中央黨委的決議案上，學習大寨仍然成為農業發展計劃的一部份；（註八）較近期，共產黨又認為，指斥大慶及大寨模式完全失敗是不對的，亦不應指責學習它們的單位。（註九）在省的範圍內，這個問題更形嚴重，涉及很多實際的問題。福建省表示「學習大寨」運動在很多地區曾使農產增加，而那些大寨式的工作隊伍並沒有學習大寨歷史中的「左傾」成份。（註十）湖南省情形亦一樣，並承認學習大寨有左傾之嫌。（註十一）

在大慶的事件上，問題不是那麼尖銳，雖然在處理問題的方式上常有混亂情況發生。在中國，石油工業所得的成果遠超一切經濟成就，而大慶就是全國唯一最大的產油地。無論在「極左派」或「務實派」當政時，大慶有很多足以教育全國的東西。在青海就有混亂事件的描述：一九八〇年這個省份承認學習大慶運動的價值；但該省的行政當局又認為，不再參照大慶式的生產是明智之舉。但到一九八一年底，其他省份則重張旗鼓再去學習大慶。（註十二）在這件事上，實

踐用作了檢驗真理的標準。

### (三) 另一個取替的模式

在農業方面，很難找到另一個取代大寨的模式。毛澤東所喜愛的爭相仿效模範之風，似乎已一去不復返。現在只有容許農村享有較大的行政自由以及增進個人利益的農業改革，才能使農產增加。

對工業方面，情形則不同。上海被認為是一個「模式」，而向它學習的自發性和廣泛程度比大慶尤甚。上海很自然地取代了油田的地位。因為上海擁有全國最先進的科技水準。但是上海不能說全無左派的遺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都市曾被認為是「極左派」暴戾人士的大本營，（而且它已被一九四九年前的資本主義背景所腐化）。（註十三）

向「上海學習」運動始自一九七九年。（註十四）他們認為這個新運動是一九六〇年代一個重要運動的死灰復燃。（註十五）令到「學習上海」這個運動在一九八〇年代產生如此大影響，其中的關鍵在於政府願意派出技術人員到全國巡迴訓練職工。上海直接供應科技知識以協助很多省份去解決生產及分配上的障礙。（註十六）

上海在全國的聯合企業上貢獻金錢及機器，這點也不容忽視。這個都市是全國的投資中心，它與國家部門及地方機構簽約提供貸款服務。（註十七）從「學習上海」中所得的實益相當可觀。學習上海最輕而易舉的方法就是合夥經營某種聯合企業。

### (四) 需要模式

在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教育扮演了一個

重要的角色。大多數人發現從實際經驗及具體事例中更易學習。擁有高度技術的單位，成了建立新標準及鼓勵全國增加經濟效率的一名好助手。

在現況下，中國更有理由去找機會建立模式，使之產生重要的影響力而加速經濟增長。自從一九七七年以來，學習由毛澤東製造出來的模式的運動已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提高個人收入作鼓勵增加生產的動力。但在物質獎勵的花費上支出相當龐大。事實上，這些跡象顯示生產成本過於龐大；工人所得的較高工資，並不能使到他們增加相稱的生產。一名官員估計說：由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工業的總值增長了23%，但在同期工業中，勞力的增產只是6.6%；然而，這三年內付給工人的賞金則較前高達六倍。（註十八）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多幹部相信政治教育以及政治理想不再如往日般重要了，因為金錢的獎賞可以鼓勵工作。近年來，金錢似乎越來越重要，解決經濟的問題，基本上就是金錢的問題。（註十九）中共對於改正這些意識，已經下了一番工夫，他們強調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金錢不能取代個人的理想。（註二十）中共希望黨員以身作則，在個人的利益以及改善國家經濟上所要求的犧牲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註廿一）

當金錢不能供應全部答案去解決國家經濟難題時，模式繼續在中國佔一席重要地位。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中國不夠金錢在這方面花費，另一方面則由於近年來的經驗證明了，更多的賞金并未導致出品的改良。

### (五) 民衆的回應

中國政府當局很想回到爭相學習的運動

去，在運動中某些農人和工人被尊為「模範」，而某些單位也被譽為「先進」單位。毛澤東死後，這樣的運動首次在一九七七年推出；雖然經過大力宣傳，似乎仍不受歡迎。原因之一也許是群眾知悉，由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一大堆值得歌功頌德的成就，全都是捏造虛構的謊言。那些江湖郎中，有些在一九七六年被人揭開了廬山真面目。除此之外，國人很有理由不信任這些挑選模範的程序。（註廿二）

一九八〇年，全國選出了一百二十三萬個先進的集體單位，以及一千一百一十五萬個模範工人。（註廿三）但被提名作模範工人，並不是使身價倍增，值得可喜可賀的事；很多地方，傑出的工人及單位往往被人譏諷，甚至被襲擊。（註廿四）工人在應付同事鄰里中，面對很多麻煩。他們乾脆拒絕這項榮譽。（註廿五）黨中央為很多地方及單位的先進人士所要面對的問題而擔憂，因此，今年草擬了一份特別報告，將它傳閱，以期減輕他們的部份壓力。（註廿六）

中國的執政人士，現正面對一個在文革時曾被熱烈地接納為模式的團體。自一九七六年重估毛澤東及其政治功過以來，大堆醜聞及錯誤在那些模範人物身上揭露出來。從此，全國上下再難相信被選為模範的英雄人物，以及更難接納在模範身上發掘出來以供大眾讚頌的功蹟。他們仍然在找尋一項適合地運用政治理想及物質獎勵以改良經濟的方案。

## 總結

政治氣候的變化使大寨和大慶逃不了被批判的命運。如果毛澤東能被批判的話，那

麼他鼓勵全國向它們學習的模式也同樣遭受批判。此外，尚有其他理由使人放棄大寨和大慶，因為它們畢竟顯得太先進，不容易為全國在短促的時間內趕上。而且它們與一九七六年的經濟政策掛鉤，而這政策又是共黨在一九七九年所揚棄的。雖然如此，這兩個模式都不能從根拔除，因為在那些稱為達到大寨及大慶式的生產單位中，往往有傑出的表現。

中國既然能從學習模式中獲益，故表示仍願意向先進事物學習。而大慶和上海正是例子；這兩個模式至少在文革時代，也如國內其他地方一樣，曾走「左傾」路綫。一般民衆對過去的種種運動已深感失望，對新的模範生產者及模範工人不再信任。為掌權者而言，這種懷疑的態度真是不幸，因更難藉此減弱仰賴物質的動機。總言之，中國政府仍在尋找另一些模式，以取代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所建立的「自我犧牲」及「崇高理想」的模式。

## 附註

（註一）七七年二月一日《山西日報》；七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華國鋒、七八年三月六日新華社；李先念、七八年八月十五日新華社；特約評論員、一九七八年第九期《紅旗》。

（註二）七九年十月六日新華社；八〇年七月九日《山西日報》；王力及張映平、八〇年七月卅一日《人民日報》；八一年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社論、八一年八月廿七日《人民日報》；八〇年十一月一日新華社

- ；言凡、八一年第一期《經濟管理》。
- (註三) 薛暮橋、八一年第二期《經濟研究》；石世印、八一年一月十七日《光明日報》。
- (註四) 八一年十二月廿五日新華社。
- (註五) 七五年十月廿七日北京向台灣廣播；七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新華社。
- (註六) 八〇年二月十一日《工人日報》。
- (註七) 七九年八月《中國建設》(英文版)。
- (註八) 七九年十月五日新華社。
- (註九) 辛同文、八一年第二期《紅旗》。
- (註十) 八〇年十二月廿二日《福建日報》。
- (註十一) 八一年三月十四日及五月八日《湖南日報》。
- (註十二) 八〇年十一月九日青海電台；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山西電台；八二年一月九日甘肅電台。
- (註十三) 七七年一月二十日《解放日報》；特約評論員、七七年第三期《紅旗》；七七年三月十二日新華社。
- (註十四) 社論、八一年四月十九日《人民日報》；七九年十月十五日《工人日報》。
- (註十五) 汪冰石、八一年第十期《紅旗》。
- (註十六) 閔淦、八一年第七期《經濟管理》；八二年二月五日及六日新華社。
- (註十七) 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及八二年五月三日新華社；八一年十一月十日《解放日報》。
- (註十八) 李成端及章鍾基、八二年第八期《紅旗》。
- (註十九) 八〇年二月一日《解放日報》；特約評論員、八一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 (註二十) 蔣一葦、八〇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社論、八〇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報》；洪韻珊及都淦、八一年十七期《紅旗》。
- (註廿一) 八一年三月廿三日《浙江日報》；八〇年第三期《紅旗》。
- (註廿二) 八〇年十月十二日及十一月廿三日新華社。
- (註廿三) 八一年七月二日《人民日報》。
- (註廿四) 八一年七月廿二日《山西日報》；特約評論員、八一年九月七日《人民日報》；社論、八二年五月一日《人民日報》。
- (註廿五) 特約評論員、八二年二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八二年一月十一日《解放日報》；八二年三月十日《北京日報》。
- (註廿六) 八二年五月十日新華社。